

## 第十三章 赴苏履任

完成中苏复交的任务后,我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这使我感到非常满意。当国联特别大会一结束,我就前往莫斯科,而不必再回华盛顿任驻美公使了。春天已经来临,但从波兰到莫斯科的沿途,几乎仍是一片白雪皑皑。自 1913 年以后,我再没去过俄国,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极欲了解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情况。

到了边境车站,果然一派崭新景象,边防战士和搬运工也不例外,他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作风不同,当他们为旅客搬运了行李后,坚决拒收小费。稍等片刻后,我们被引领坐上苏维埃铁路快车,该车加挂了前“万国铁路卧车公司”的列车,车厢年久失修,气味难闻,但坐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如果把苏联的情况一一详细记录下来,至少可以写成几百页厚的一本书。苏联尽管失去了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小国,幅员仍然十分广阔。除了占有欧洲很大一片地区和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外,其还占有中亚的一大片土地。苏联、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都是幅员广阔的国家,火车在一个方向上疾驶几天都到不了国境。毫无疑问,苏联境内,从海参崴到莫斯科,再到波兰边境的铁路旅程,是世界上一国之内最长的铁路旅程。另一条漫长的铁路旅程是从莫斯科向北走,到摩尔曼斯克,向南走,到黑海边,或向南走到塔什干,到塔什干的铁路也是通往中国新疆的一条路。这几条线路坐快车都要花费好几天时间。

苏联之令人生畏,不仅仅在于它的地域广袤,它的众多人口同样值得我们注意。该国有人口 1.6 亿之多,至于民族,如果将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计算在内,则多达 150 多个。苏联的人口因民族众多,差异很大,情况非常复杂。尤其是,在这个联盟之内使用多种语言,以及语言本身的难学,使外来者对确切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感到极其困难。苏联的交通工具有火车、轮船、汽车和飞机,但相对来说还不很发达。外国人要使用这些交通工具,几乎总是需要得到苏联政府的允许和帮助,因此,在苏联境内的旅游远不是简单和容易的事。苏联在政治、社会、军事和工业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还将继续下去。正因为苏联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所以,任何对于苏联情况的描述,可以说都是不全面的和不完全正确的,当然也不可能是最新的。

评价一个国家和人民的进步与发展,有必要将这个国家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作一比较。大多数到苏联的访问者并不了解革命前沙皇时代的俄国情况,而那些了解的人,当然多数是从俄国移民出去的,他们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机会了解新的情况。所以,不经过多年准备,不可能有一部比较详尽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关于苏联现实情况的真正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我在这里关于苏联的介绍,属于随机记录性质,并非专业性论著。因为手头缺乏参考书,个人也没有收集什么资料,内容全凭自己的记忆,所以肯定不全面且平淡无奇。在有些国家里,出于礼貌和慎重,不允许现职的甚至已退休的外交官口头谈论,或著书涉及驻在国的情况。中国没有这样的规定,但可以想像得到,受到外国国家与人民友好款待的作者,不会太随意地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也不会对他们进行不友善的评论。同时,作者也不会反过来为其大

唱赞歌,像那个留美的中国女学生那样,漫无边际地赞美美国,甚至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明亮得多。

无论持什么观点来评论苏联,也许有一点是必须避免的,就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例如,认为苏联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规范完全是欧洲式的,就像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欧洲国家一样。其实,历史上的俄国,好比连接欧亚两大洲的中间站,坐落在东欧,而人口中有许多属于亚洲民族,她曾多次遭受亚洲游牧部落的蹂躏,因此,俄国,作为欧洲的俄国,却深深地受到东方式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尽管俄国彼得大帝很早就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这个国家直到最近这些年,在工业化方面还没有达到西欧国家那样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教育还没有普及,文盲的数量自然相当大。

多数人看来还没有意识到苏联仍然处在革命的痛苦过程中,虽然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但工业革命的任务还极为艰巨。因此我们的所见所闻无不带有革命性质,例如,领导干部的类型,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行动,他们的动机、观念,和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个事实,即革命虽不再像过去那样激烈,但还远未进行到底。整个国家仍然在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而奋斗,也可以说在捍卫社会政治秩序的再建设。还有,苏联仍在军事管制之下。总之,由于在苏联有着特殊的政治体制,盛行着特殊的社会观念,因此,那里的生活情况与那些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不是在苏联生活比较长的一段时期,是不可能体会到这种不同的。如要真正了解、懂得今日苏联,以上各点,则不容忽视。

现今的明智之士,处事为人,不会采取过分赞美或竭力反对的态度,常常以开阔的胸怀、容忍的心态对待之,能够相当客观地讲述自己的印象和描述自己的经历。他们虽然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自己国家的思想和制度是最好的,但他们绝不坚持把这种思想和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反过来,他们也希望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不要把他们自己国家的思想和态度强加给别国。

常言道,第一眼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而且常常是最真实的。人们第一次来到苏联,肯定会感觉到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以后每次再来苏联,仍然会是这种感觉。从漫长的铁路线,到高大的建筑物(即便是原木建成的),从无边无垠的草原和森林,到身材魁梧的男男女女,无不显示出这个国家的伟大。来到中国的人们会有同样的印象,特别是来到北平时。北平规模宏大,尽管有些地方不免显得脏乱、破旧和贫穷,但整体上仍然给人雄伟、庄重和威严的感觉。

前面我曾提到1913年时我在莫斯科小住过。1933年再到莫斯科后,眼前所见的情形与过去确实不同了,这里不如以前那样繁华灿烂与充满乐趣。当然,这座城市曾经经受了流血革命带来的一切困难和痛苦,贵族及富有的资产阶级式的闲情逸致、寻欢作乐和奢侈糜烂都已绝迹。现在,这个国家正在实行计划经济,人民为此必须忍受艰苦,并作出牺牲。食物供应不太充足,轻工业还不发达,日用品也很欠缺。住房问题因人口短时期内的极大增长也变得越来越严重。物价按照卢布计算,高得吓人,如在一个大宾馆里,宴请20多个客人,需要1万卢布;乘坐敞篷四轮马车,很短的路程就需20卢布,等等。

除此以外,这里气候也非常恶劣,冬季里气温常在摄氏零下

35℃以下,每年将近10月底就开始下雪,一直要下到第二年5月初。可以想像,一个人已享受惯了明媚的阳光、丰富的蔬菜和食物,以及其他大量价廉物美的东西等等,他要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生活将会感到多么压抑。

到达莫斯科车站,我们大使馆的人员由王参赞带队前来迎接我们,在原负责中国购买中东铁路谈判的莫代表去意大利疗养后,王参赞继续未完的谈判。前来迎接我们的还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礼宾司司长。当然也少不了大批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我特别注意到一位女摄影记者,她动作敏捷,从一处冲到另一处,快速抢占有利的拍摄角度。

以前我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馆舍因两国绝交而遭弃用,现在的使馆设在一座相当小的旧房子里,作为大使驻节之用实在不适合。我们过去的那幢馆舍,当时被十几个苏维埃机构占用着,甚至大厨房也被拆了改成办公用房,而浴室则改成了一个小厨房。想重新得到那幢房子,还不知需要多少个月的谈判,要回来后,清理、维修,以及准备办公家具等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在莫斯科的第一年,租用了旅馆里的一套房间,这里当然很舒适,但租金昂贵(要用美金支付);吃的方面,一开始的新鲜感过去后,总觉得十分单调,吊不起人的胃口。

苏联政府对我的接待极为热诚周到,礼宾司司长告诉我,苏维埃国家元首将于我到达的第三天接见我。因我的沉重的行李恐怕不能及时到达,而我的外交礼服都在行李里,我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了李维诺夫,他说,接见时,我穿什么都行,苏维埃的习惯不怎么注重形式的东西。的确,我发现这位外交人民委员的穿着与他在日内瓦时截然不同,那时他的穿戴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官

样,而在国内办公时,他的服装式样、料子,以及他的帽子,都是无产阶级式的。不过,我的行李及时到达了,于是我像以前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晋见元首时那样,穿上外交礼服,在克里姆林宫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递交了国书。加里宁先生确是一位慈祥的、具有绅士风度的老者,颇像资产阶级的慈善家,而绝不像过去工厂里的工人,也不像想像中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在旧皇宫接见大厅里的正式仪式结束后,我们来到一个小客厅,由李维诺夫当翻译,我和加里宁进行了短时间交谈。我又向加里宁一一介绍了我的参随各员,随后我们告辞。

一般来说,莫斯科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首都有很大差异,我在那里所遇到的困难使我难以忍受。不像其他欧洲城市那样,莫斯科本身没有独立的新闻报道,我们也买不到外国的书籍、杂志和日报,这使我们难以获得信息,无法知道苏联或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使馆中有一个随员精通俄语,每天为我翻译报纸摘要和编者按语,同时,借助所聘的俄语教师的帮助,我得以浏览每天的报纸,以使我至少了解重要事件。曾在广东任过我国顾问的鲍罗廷办有一份英文的《莫斯科每日新闻》,我贪婪地阅读这份报纸。后来又有了两种刊物,一种是德文的,一种是法文的,分别是双周刊和旬刊。这些报纸刊物对于身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来说,犹如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所有的出版物都是官方出版物,并且严格封锁,即便想撩起文件的一角偷看一眼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可以说,他们绝不让局外人看到任何东西。在苏联生活时,想得到任何有关的信息,都会使人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无助与无奈。

我们除了与苏联官方和半官方人员有很有限的交往外,与当地人民很难有接触,当然更谈不上交朋友了。苏联当局不赞成外

国人与苏联人交朋友,如果外国人坚持与某苏联人交朋友,那么,他的这个苏联朋友就会受到警察的监视。在苏联,外交官生活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环境中,这种隔绝比起过去的北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一个使馆的门前,都有警察站岗,岗亭内配备有专用电话。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每次外出,都有警车跟随“保护”。

参加了两三次盛大的交际性聚会,与想见的苏联政要都见了面。在苏联的外国人既然除了少有的公共场合之外,无法接触当地人民,与当地人民之间仿佛隔着一道又厚又高的墙,于是,这些外国人就想设法扩大他们自己之间的交往,以缓解缺少社交带来的压抑。

奇怪的是,沙皇时代的俄国人以擅长各种语言闻名,而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除了俄语外,没有什么人能说其他语言。无论是在大宾馆、大商店,还是在街上,几乎碰不到一个会讲任何一种外语的人。有文化的专业人员、教授是学过外语的,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旧时代留下来的,要遇见这些人只有在专业场合。

从客观情况来说,莫斯科乃至整个苏联,令人感到新奇而有意思,因为它与欧洲其他国家太不同了,它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但从主观感受来说,这里的气氛和环境如此压抑,令人感到像是在夜幕中摸索,对所有听到的甚至见到的都有点不敢相信以为真。如果不是在苏联居住较长的一段时间——几个月或几年,并且多读书多琢磨,那么,出门还得要导游带领,这样自然不可能得到第一手信息,也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

作为惯例,新到苏联的外交使节应由礼宾司司长陪同参观,这位司长曾在沙皇时代任过职,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陪同我们参观了模范监狱、模范工厂,还有工人俱乐部等等。有一座监狱坐落

在一片森林附近,犯人并没有被禁闭起来,而是可以在狱中自由走动。他们学习各种技艺,甚至还拥有一个铜管乐队,他们在这样的“监狱”中过得很自在,以至于不少人刑满释放后又回到那里,因为他们非常满意那里的住处和所受的待遇。我们还参观了克里姆林宫里的博物馆,参观了教堂,还有一次在莫斯科城中游览,包括游览中国城,过去中国商人到莫斯科做生意通常就住在中国城。

莫斯科的人口由150万增长到了350万,城市随着人口的增长也不断扩大和改进。但市内的交通工具仍限于有轨电车,而这种有轨电车相当拥挤,就像中国在战争时期难民乘坐的火车那样。帝俄时代的敞篷四轮马车已经难觅踪迹,至于出租汽车,据说全市只有100辆。外国使馆全都自备汽车,这些汽车都是进口的,因为莫斯科不销售汽车。当他们的汽车出了毛病就很难修理,因为汽车修理厂实在太少了,而即便有也难以得到修理服务。

不久,苏联政府明显地表现出并不满足于仅仅与我国恢复外交关系,而是渴望推进与我国的政治和商务关系。于是,我起草了两份草约,即商务草约和互不侵犯草约,送呈南京研究,如果可以的话,即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那时我国政府似乎正在忙于其他方面的事情,而在进一步发展中苏关系上裹足不前。也许某种势力已经在起作用,将我国政府的注意力引向了其他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在中东铁路沿线打游击的三位将军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在成功地坚持抗击日军一段时间后,撤出了满洲,当他们取道莫斯科前往西欧或回国的途中,我和他们在莫斯科车站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会面。当时苏联不允许他们下火车,中国使馆只好准备了一些中国饭菜送到车上。马将军在黑龙江曾以骗取日军的信任然后狠狠打击日军而闻名,他兴致勃勃地对我



讲述他的抗日功绩。苏将军是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他也抗击过日军,但最后不得不撤退到满洲边境车站。在撤退途中,可能因为时间不够或准备不足,他没有炸毁东安山(Tung-an Mountain)隧道,使日军得以尾随他迅速追过来。被迫撤至西伯利亚的东北军队后来转移到了新疆,在那里被盛世才将军收编,盛世才后来任新疆省主席。

我在莫斯科的头几个月里,遇到的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是有关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的问题。如前所述,早在1920年10月,交通总长已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谅解备忘录,将原来有关中东铁路的条约加以修正,以使该铁路成为纯粹商业性的中苏合营企业,使我国人士也有权出任管理该路的高级职员,并在最终出任理事会理事。后来在1924年,顾维钧与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了关于中东铁路的法定地位及管理权的正式条约,约内载明,将召开两国政府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中国赎买该路的价格、条件及转交手续等事宜。

在讨论赎买问题的同时,中苏开始联合管理该路,双方各派5人出任理事会理事。新采取的管理方式虽然在理论上是最好不过的,然而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因为两组理事之间的争执没完没了。

随着1931年9月18日日军对满洲的侵略,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莫斯科谈判赎买中东铁路事宜的中国代表,不再受到莫斯科当局的重视,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中国谈判代表莫德惠为此深感失望和懊恼,离开莫斯科去了德国和意大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随意使用中东铁路运送其军队到北满,并将北满迅速控制起来,所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只好率部撤到西伯利亚。苏联方面对日进一步采取绥靖态度,承认伪“满洲国”指派的新铁路督办,甚

至在沿线车站升起伪“满洲国”的旗子。而日本军阀却利用伪“满洲国”为工具,给铁路沿线的苏联人制造种种不便,使他们难以忍受,目的在于迫使苏联人完全撤出中东铁路,最终将中东铁路归入南满铁路系统中。苏联方面将一部分车辆转移至西伯利亚,并陆续从哈尔滨等地撤走苏联人,以使自己在铁路被日本占领时少受些损失,此外,苏联政府毫无办法来阻挡日本最终占领铁路,除非诉诸武力,而这在苏联政府看来是完全不值得的。既然被逼到如此地步,苏联终于决定将这条铁路卖给伪“满洲国”,当然也就是卖给日本。

5月初,莫斯科报纸上载有一条短讯,说在日本大使与李维诺夫的一次会面中,李维诺夫谈到苏联有可能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我立即约见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先生,他向我保证报纸上的消息不真实,我把他讲的话报告了南京政府。不久,我会见了李维诺夫,他承认,确实如报纸所报道的,他对日本大使说过有可能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他还说,加拉罕向我保证没有那回事,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他。对此,我感到极为惊讶,并声明,虽然加拉罕先生主管远东事务,但今后我难以与他再打交道。

此后,我们认为,加拉罕先生作为与顾维钧博士签订中东铁路协定的当事人,自然极不愿意看到李维诺夫政策的实行而使他签订的协定变成一纸空文。他极力想维护这份协定的尊严,没有到它最后被废止的时候,始终对我说他的上司没有提出过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的建议。然而,他在与李维诺夫的争执中失败了,随后他被发配到安卡拉任驻土耳其大使,这可能与我对他的强烈不满有关。

当我与苏联高层官员接触较多之后,我与他们进行过多次闲谈。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位官员,指导苏联外交政策的总体原则是什么?“原则?”他声称,“搞外交没有原则可言,只有利益。”他坦承苏联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真使我大吃一惊,联系到苏联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崇高原则和理想的大量声明,感到太出乎意料了。然而,中东铁路的出售使我们相信,他那一瞬间的表白说出的是真相,虽然他本可以说得稍微隐晦一些。自那以后,很多事情进一步肯定了这一事实,即苏联指导对外关系的最高原则就是自身利益。

后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极力为他们破坏中苏两国政府间庄严协定的不正当行为进行辩护,对已受伤害的中国进行侮辱,说什么自1931年9月18日之后,中国不履行协定中规定的应承担的义务,把此后发生的一切困难都推给苏联一方来承担;苏联既然不可能单方面继续保卫这条铁路,只好决定将它出售,并且说苏联有权这样做。他继续说,至于中国方面,不应抱怨这条铁路被出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对中国有利。一条铁路不是什么日本人可以弄到日本去的东西,中国肯定盼望收复满洲,一旦满洲收复了,不就可以额外得到中东铁路且不必为它付款了。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就是以这种强词夺理、挖苦讽刺的态度来为他们破坏庄严的国际协定的行为辩护的。中国当时除提出严重抗议外,也无其他有效的办法来捍卫自己在这条极为重要的铁路线上的权益。然而,我国人民对于新生的苏联政权一再表白的崇高理想,特别是苏联与中国的友谊之类的信任,由此受到重重的一击。

此后,我离开莫斯科有几个月,这是因为由国联召集和主持的

国际经济会议即将在伦敦召开,我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财政部长宋子文电告我去伦敦与他见面。我在柏林耽搁了一些时间,为莫斯科的新使馆订购家具和室内用品,然后前往巴黎,与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一起到瑟堡,登上宋子文一行乘坐的开往南安普敦和伦敦的邮船。

国际经济会议特由英王莅临主持开幕仪式,盛况空前。如同世界裁军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先由各代表团团长就其政府的观点和愿望发表演说,然后进行一般性辩论。宋团长在演说中,除了对受经济萧条影响而面临诸多困难的国家表示同情,并表示中国愿意尽力给予帮助之外,还指出至于失业问题,则中国几乎始终存在着几百万的失业者。美国代表团团长针对世界经济衰退提出的解决办法,在有关贸易问题上无非是提高进口税率、差别对待和承认金融集团等,这些办法恐怕很难使听众接受。像裁军会议一样,这次大会也分全体会议、委员会会议和特别委员会会议,但这一次可能因为中国商业和经济方面的潜在力量,中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议程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令人失望的是,不久这次大会同样显现出,它将无果而终。

不过,从社交角度来看,各代表团倒是尽情享受了一番,因为英国政府和伦敦当局不厌其烦地盛情款待他们。英国王室也接见了代表团团长,很多团长还被邀请与英王和王后共进午餐。英廷还在白金汉宫举行游园会,王宫里的花园特别大,英国王室接见代表们时,英王和王后坐在华盖下,威尔士亲王单独在一个地方,其他王子和公主一起呆在另一个地方。英国首相也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国代表,代表们都身着礼服赴宴,盛况空前。同样的盛况还出现在伦敦市长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的盛大晚宴上。英国下议院议长

则先在下议院分别招待各国代表,随后又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招待全体代表。

最美仑美奂的一次晚宴,是由“金银手工艺品公司”举行的,餐厅内陈列着十分珍贵的、历代贵金属手工艺品的代表作。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晚宴由担任公司名誉董事的一位勋爵主持,这样可以使公司请来王室权贵。晚宴作了精心安排,以浑厚优美的男声四重唱开始,而晚会结束时,则有一只盛有玫瑰香水的纯金盆在桌上传递,供客人洗手。

在查塔姆公馆举行的一次令人愉快的招待会上,我们遇见了许多曾经旅居远东,或对远东感兴趣的英国男女人士。另一次极为引人入胜的户外聚会是在爱斯科(Ascot)赛马场,由于有王室成员出席观看,因此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常常在那里身着盛装,成群结队地招摇过市。我虽然没有机会看到在爱普瑟姆(Epsom)举行的德比(Derby)赛马会,但是我很幸运地看到了“蓝带锦标赛”的获胜马——“蔓纳”,这匹马属于住在新市(Newmarket)的一个朋友,我们一群人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一整天。不过,我们对于马这种动物显然纯粹是门外汉,虽说“蔓纳”已经成为一匹良种马,我们对它仍然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伦敦度过的几个月,使我们亲身感受了英国的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富足和奢华,代表们还参观了坐落在乡间大花园中的英国上层人士及乡绅的豪宅,这一切给我们的印象确实太深刻了。我们还有幸到伦敦郊外游览和欣赏美景,毫无疑问,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正是伦敦,使世界各地服从于它已达百年之久。

宋部长因会议进度缓慢而有些焦虑不安,急着要回国处理重要政务,因此离开伦敦,取道欧洲大陆先行回国了。有关代表团的

工作就由我来负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白银协定》的事,也交给我来办,这件事与大会没有直接关系。《白银协定》是由极为关注白银问题的美国参议员皮特曼(Pittman)提出来的,协定的基本内容已由宋部长在华盛顿敲定,在伦敦,对协定内容进行了最后审定,并作了细微的修改,然后由我代表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该协定第四款规定中国的责任是,从1934年1月1日起的4年内,中国不得将国内银币销熔成生银出售。该协定的目的是缓和世界银价的暴涨暴跌,以维持并推广使用白银作为辅币。

这次大会期间举行的多次社交活动,使我们有机会见到英国朝野大多数政要,他们中有些人我在日内瓦就多次见到过。他们的机敏、智慧和丰富的经验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也有不少人,如果不说他们无知的话,起码可以说对远东的情况缺少了解,尽管英国长久以来与世界的这个地区始终有着密切联系。当我私下即使是在同众议院里的各党领袖们谈论到中国发生的战事情况时,我也发现他们对于事实真相简直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也许国内的事情已经够使他们操心 and 烦恼的了,令其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研究远东问题。然而,远东问题最终对欧洲、对英国本土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那时他们才想了解,但却为时已晚。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交通运输工具的日新月异,使地球似乎缩小了许多,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他们的眼界仍然那么狭窄,即便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帝国的领袖们,也看不见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已发生的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墨守成规,思想仍然停留在世界各地处于孤立状态的那个时代,那时,世界一部分地区的人民过着舒适和安逸的生活,而另一部分地区的人民正在遭受动乱和灾难的煎熬。人

们本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刻骨铭心的教训,但却没能做到这一点,民主大国们一个个翻了个身,又开始昏睡了。

中国代表们至少感到无愧于良心。他们曾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上尽了最大的努力,提出严重警告:世界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必须制止侵略。而在国际上,也有一个外交部长以他的智慧和直觉,看到了如果国联的原则被抛弃,将会发生什么。他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博士(Benes),他曾经对我说,他在国联里帮助中国说话,实际上也是为了帮助他本国,因为他本国与中国有着同样的处境。不幸被他言中,不到10年,他的国家遭到了与我国满洲相同的命运。

在伦敦期间,我还有幸参观访问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我的次子毕业于天津新学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该院院长是赫立德博士(Lavington Hart),一个著名的剑桥学者,他很希望我的次子进剑桥深造。于是,我与我的次子带着赫立德博士致剑桥圣约翰学院评议会主席的介绍信,前往接洽入学事宜,但被告知,名额已满,本学期无法安排。他建议我的次子在城中的莱氏预备学校先学习几个月,准备参加入学考试,考试通过后,再进圣约翰学院。后来,我儿子通过了考试,但他同时也被美国西点军校录取了,于是,他去了美国。

我的长子毕业于英国桑德哈特皇家军官学院(Sandhurst Royal Military College),他能入该院学习,是因为我在日内瓦所结识的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的帮助。英国的军事教育体系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如在桑德哈特,学员经一年半的学习就毕业,而在西点军校,则要学四个学年,还有三次夏令营。看来,英国更多侧重于军官将来对军队的指挥调度,不十分强调理论学习。军

官一毕业,即被派往印度实习,以获取实际经验。西点军校的学生要学的课程实在太多了,这些课程使他们在今后不仅能成为一个军官,退役后还能胜任各行各业。我见过西点军校的人,他们作为工程师、银行经理、企业董事、甚至外交家,都很出色。他们也接受各兵种的专门训练,如步兵、骑兵、炮兵,甚至航空兵的训练。而在英国,一个军事学校专门进行某一兵种的训练。英美军事院校中学员的待遇也非常不同,在英国,学员是“学生老爷”,有勤务兵为他们服务,教练员称他们为“先生”。

对牛津大学的访问则是一次相当正式的访问,因为我是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博士、我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同往的。我们应邀出席在大学学院举行的午餐会,午餐会上,校方领导都身着学校礼服,还见到一些著名的犹太裔教授,他们是从德国流亡到英国的。午餐会也很有趣,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在大厅里用午餐;第二步在另一客厅里品尝甜点,同时座位也有变动;第三步是在室外庭院里喝咖啡和吸雪茄。随后,我们又参观了其他学院,欣赏到了优美雅致的花园和有百年历史的草坪。我们在牛津大学这个历史悠久的、世界闻名的教育中心,在她那浓浓的学术氛围中,度过了极为愉快的一天。

在伦敦举行的大会拖拖拉拉已经持续几个月,看来在经济或金融问题上最终也无望达成任何谅解,因此我也离英返回莫斯科。这一次,我选择了另一条路线,经什切青(波兰港口城市)、波罗的海国家、芬兰,抵达列宁格勒。我在德国一个港口乘坐的芬兰船只,船身漆成白色,洁净无瑕。在波罗的海的塔林港,抬头望去,一处高岗上,两座不同派系的巨大的宗教建筑物巍然对峙,一边是路德教教堂,一边是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眼前的景象,不禁使人联想



到历史上日尔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的争斗。

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坐落在海岛上,是一个面积不大但景色秀美的城镇,我在那里过了一夜,继续前往列宁格勒,即过去的圣彼得堡。

列宁格勒这座名城,原是彼得大帝时代修建的帝俄京都,现今依然给人以雄伟壮观之感。它在很多方面颇似我国故都北京,当政府迁移南京之后,南京就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但是,从城市建筑来看,宽阔的马路、涅瓦河上造型雄伟的桥梁、现代风格的楼群和整个城市的设计风格,无不表明列宁格勒应属西欧式而不是俄式城市。帝俄时代,它肯定是人们向往的居住胜地,那里的宫廷生活多姿多彩,又有众多的学术机构、博物馆、艺术馆、歌剧院,还有郊外的离宫别馆等等。随着革命之后首都迁往莫斯科,这座城市不再是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了。

在列宁格勒,过去列强各国的驻俄使馆馆舍现已改作领事馆,或干脆关闭。冬宫,就像北京的故宫一样,已向旅游者开放,让人们了解以往沙皇的生活方式。许多寝宫保持着原貌,从中不难看出过去皇室成员的迂腐无知和道德水准的低下,北京的故宫也是这样做的。著名的大教堂已改成反对宗教的展览馆,该馆的圆屋顶中央垂下长长的一根线绳,末端系一个铁球,好像一个钟摆,用以表示地球转动,反驳《圣经》中的天动地静之说。我到达列宁格勒时,已是9月份了,户外演出有配乐喜剧之类,但没有大场面的歌剧。苏联的大城市中,都驻有外交人民委员会派出的代表,我们在列宁格勒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很方便地参观了我们想参观的地方。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对于我们方方面面照顾得极为周到。

我刚回到莫斯科不久,有一个消息使我很感突然,就是正在访问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的我国外交部长罗文干博士,要经西伯利亚回南京。我立即向他发出访问莫斯科的邀请电,但他不能到莫斯科,而是建议我到土西铁路(Turk-Sib Railway)的北段终点站新西伯利亚与他会面。我们二人在那里交谈了三天。地方当局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使我们诧异的是,在这个西伯利亚小镇上,不知他们从哪里弄到了鱼子酱和其他美味佳肴,还有各种葡萄酒来宴请我们。

罗博士非常感谢我给他发出邀请电,因为这封邀请电使他得以离开新疆。新疆省当局在很多问题上与罗博士观点不同,因此不同意他西行,不供给他足够的汽油。但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得知罗博士将在新西伯利亚与我会面,并可能访问莫斯科后,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汽油。由于南京对新疆的政策没有被该省当局很好理解,新疆方面的种种猜测造成了这次误会。黄慕松将军到迪化去视察,要离疆回南京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麻烦。因我去新西伯利亚见罗博士,那一年的国联大会,我就不能参加了,由顾维钧博士填充我的空缺。

在罗马天主教史上,这一年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中国前外交总长、几度出任过驻外公使的陆徵祥,在比利时的布鲁日被晋升为天主教本笃会司铎。陆徵祥的夫人是比利时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不幸去世时,陆徵祥在她床边发誓要皈依天主教。他首先准备成为一名修士,于是,开始在奥斯坦德附近的本笃会隐修院按规定研修教义课程。他还必须遵照该会的要求生活,对他来说,这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他已年老,平时生活又是随便和舒适惯了,所以,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为了纪念他的亡妻,经过

6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圆满达到了全部要求,迎来了任圣职的这一天,罗马教皇指派前驻北京教廷代表康斯坦丁主教为特别代表,前来为他主持任圣职仪式。他在国内外的老友和过去的同僚们,赠送了上有题词的丝轴或金匾。我国驻欧洲的外交官,只要能离开几天的,也都出席了仪式。仪式在一宽敞而肃穆无华的教堂内进行。仪式后开始进行大聚餐,大家都默默地吃,互不交谈,只有在一个教士颂读经文时,这种寂静才被打破。聚餐会结束时,由康斯坦丁主教、我国驻比利时使馆代办及隐修院主持分别致贺词,最后,皮埃尔·塞莱斯丁·陆徵祥司铎(Dom Pierre Celestin Lou Tseng-tsiang)致简短答谢词。第二天,我国驻布鲁塞尔公使馆特设午宴招待比利时各界要员,大家谈论陆徵祥受封圣职之事,为中比关系史留下了一段佳话。在中国天主教史上,近年来还没有听说有哪位皈依者,有像陆徵祥那样的不平凡经历,接受如此荣典。陆徵祥最初打算回中国,在峨眉山建一座修道院,终因健康关系,未能如愿。

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比较平静,我又离家近两年了,特请求回国休假。我经巴黎到威尼斯,准备坐船回国,正在这时,遇见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威廉·布力特(William Bullitt),他在莫斯科递交国书时,我没能见到他。这次,他是回华盛顿去安排使馆职员问题,他的使馆职员将会有很多人。他很幸运地在莫斯科得到一座宫殿似的建筑作为使馆馆舍,这座建筑原是留作加里宁主席招待宾客之用的。苏美建交,李维诺夫功不可没,他成功地访问了华盛顿,与美国达成谅解,使美国对苏联作出外交承认,并特派年轻有为、很有影响的、与罗斯福总统有私交的外交官布力特为首任驻苏大使。苏联领导层极为满意布力特大使,处处为他提供方便。布力

特方面也极希望发展与苏联的商务关系,作为克服他本国经济严重衰退的一个手段。当时盛传苏联将向美国购买价值达几亿美元的物资。

我在威尼斯搭乘开往上海的“罗索伯爵”号意大利邮船,在船上遇见了几位欧洲朋友,和几位游览欧洲大陆后回国的同胞。一路上,饱览各个港口的风光,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其间,我第一次来到了开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博物馆、金字塔等等。但是,船上对我们中国旅客的态度使我们很生气,船长毫无礼貌可言,乘务员既呆板又冷漠。

在船抵塞得港时,我致函墨索里尼,指责船上对我们的态度,并说他想通过邮船航线促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目的,已被他的国人的行为所损害。这封信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抵达新加坡之前,船长到处找我,对于没有注意到我在船上表示道歉。后来,在南京晋见林森主席时,他说他以前从瑞士回国,在另一条意大利船上也受到过同样的怠慢,他说到这事仍很气愤。外国轮船公司无非想挣我们乘客的钱,但却不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还不以礼貌待人。国人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正式提出抗议,绝不意味着心中没有抱怨,也绝不意味着以后还会乘坐这样的船。不管怎样,这种经历肯定使国人对有关国家留下恶感,这当然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在南京逗留了几天后回到天津家中,就去北平拜访主持政务和军务的黄郛将军及何应钦将军。他们两位都是蒋介石将军的心腹,于私于公都是代表蒋来担此重任的。我与黄郛将军在北京政府时代就相识,他现在作为国民党的中坚人物,在北平身负重任,曾声言如有必要,宁可像李鸿章那样,不惜牺牲个人声誉,与日

本进行和解。不过,他只是在1933年5月奉命与日本签订所谓的《塘沽协定》,为此,他遭到国人的严厉指责。这次他见到我,竟用了两个小时向我解释,在那种不可抗拒的胁迫下,签订那个协定没有错。

那时,值得一提的事情,还有蒋介石将军到北平视察。黄郛将军在旧外交部大楼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各党各派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还有很多北京政府时期的阁员和将领,这些人曾经都是反对派。所有的仇恨和个人恩怨都已成为过去,甚至连满蒙王公也都应邀赴宴,向中国新领袖表示效忠。宾客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吴佩孚和吴光新将军、那亲王,以及很多的政治家,有些是从天津来的。总之,清朝遗老、在野名流、军阀党徒,济济一堂。前国家政要和知名政治家们对国民政府没有忘记华北,蒋将军亲临视察,都感到十分满意。这次视察使对南京政府的种种不满和误解都冰释雪溶了。蒋将军本人对于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也甚感高兴,回到南方后,对北方印象颇佳。

1934年夏天,我在庐山牯岭住了一段时间,那里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我有机会多次见到蒋介石将军和其他政要。在那里举行的几次大会,我们外交界的不少人都出席了。随后我又去了青岛,愉快地度过了夏天。青岛很有些像法国的里维埃拉,这是因为青岛市长沈鸿烈将军富有公职精神,他不断努力整顿,改进和美化市容,从而使青岛成为中部沿海的消夏胜地。

我刚从欧洲回国时,先去了南昌,因为蒋将军正在那里坐镇围剿共产党。他在江边的一座教会的大院落内,租住了一幢不太起眼的房屋。看来昔日的传教士们真有眼力,选择该地建教堂,当初购买那块地时,那里显然很落后,离城镇也很远,然而,经几十年不

断规划、改进,栽树、种草、种花,现已树木成荫,绿草茵茵,鸟语花香,成为南昌市最引人入胜的佳景。